·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

DOI:10.20004/j.cnki.ujn.2025.01.005

普惠金融“范式革命”:基于中国范式的分析框架

邢乐成

(济南大学 金融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02)

[摘 要]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颠覆了金融只为富人和高端客户服务的价值取向,从金融哲学观的层面上看,它是一场全新的“范式革命”。所谓范式革命,是指普惠金融的出现是金融改革和金融深化的重大事件,它超越、改变了传统商业金融原有的理念、价值取向、技术标准和经营模式。无论是范式的理念和信仰,还是范式的价值和技术要素,普惠金融都是对传统金融范式的扬弃。如果还用原有的金融范式看待普惠金融,就不会改变普惠金融理论和实践的两难困境,就不会看到普惠金融的巨大价值及对未来的深刻影响。对于这种变化,只有站在一定的金融哲学观高度和范式革命立场,才能领悟和洞察。基于此提出普惠金融“范式革命”分析框架,以期作为讨论的深化。

[关键词]普惠金融;范式革命;中国范式;分析框架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25)01-0040-09

一、引言

2016年党中央国务院将普惠金融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普惠金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金融工作的“五篇大文章”之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但在普惠金融的发展中,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都还存在一定问题。从理论研究上看,尽管普惠金融有着十分丰富的中国素材和经典案例,但普惠金融研究仍局限于西方传统商业金融的分析范式。虽然出现了不少数学模型和研究技术,也形成了一些研究共识,但从整体上看,还没有形成基于中国范式的分析框架。从实践探索来看,普惠金融的实践仍沿用传统商业金融的经营模式,尽管中央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不断发出明确指令,但到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只是被动地听命、执行和应付任务,还缺少发展普惠金融的使命担当和自觉行动,以至于许多“使命漂移”的现象屡屡发生。理论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都与没有形成普惠金融研究的中国范式有很大关系。

金融研究范式的确定,本身是一个哲学问题。如果没有哲学观的重新思考,新范式的确定将难以想象。可以说,没有新的哲学“求助”,就没有新的研究范式;没有新的研究范式,自认为深奥复杂的理论探索和学术成果,都只不过是由一些看似精致的概念和模型纠集而成的“乌合之众”①。所以,哲学求助的过程,是一个思想实验的过程。归根到底,思想实验可以超越工具、技术甚至制度与

[作者简介]邢乐成,济南大学金融研究院投融资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冉希美,王定祥:《普惠金融数字化、消费环境优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张杰:《金融学的范式革命》,《金融博览》,2020年第3期。

时空局限。只有空洞浅薄的所谓的科学研究,才会单方面依赖分析技术。

本文在全面梳理范式渊源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基于新的哲学“求助”和普惠金融的中国素材,提出了普惠金融“范式革命”(Paradigm Revolution)的分析框架。按照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对范式的基本解释,范式是一个具有整体性认识世界的框架和价值标准,是理念、理论、技术、价值等于一体的综合性范畴。所谓范式革命,是指普惠金融的出现是金融改革和金融深化的重大事件,它超越、改变了传统商业金融原有的理念、信念、价值取向和技术标准。从中国范式的理念要素看,普惠金融的理念是“以义取利”,是大同、和谐与包容,它超越了传统商业金融只为赚钱和“唯利是图”的商业化诉求;从中国范式的价值要素看,普惠金融的价值取向是“人民性”,追求金融服务的均等化,它更强调金融伦理和社会道义,这就超越了传统商业金融只为高端客户和富人服务的价值取向;从中国范式的技术要素看,普惠金融的技术范式,是基于“大数据和赋能平台”的数字金融微贷技术,它用大数据替代抵押资产作风险评估,改变了传统商业金融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核心的技术范式。凡此种种,普惠金融的中国范式无论从世界观还是方法论上看,都是对传统商业金融的反思和扬弃。对于这种变化,只有站在一定的金融哲学观高度,才能领悟和洞察。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的金融市场上“黑天鹅”事件不断出现,尤其是在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时,人们对未来金融市场的预测变得更加复杂和担心,金融危机可能随时发生。这种局面的出现,也就意味着金融革命的到来。库恩曾将危机看作是“新范式”出现的前提,他提出,在科学研究领域也和制造业一样,更换工具是一种浪费,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会这样做。危机的意义就在于:它指出更换工具的时机已经到来了[①]。本文基于普惠金融的中国素材,提出普惠金融“范式革命”的分析框架,以求教于读者诸君。

二、范式溯源与基本特征

“范式”一词在科学研究中被广泛使用,不管是自然科学研究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但在不同的学术领域和语境下,“范式”一词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一)“范式”溯源

“范式”概念来自于希腊文。原意表示“共同显示”的意思,并逐渐演变为典范、范例、样式等含义。但真正把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运用到科学研究中去的,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他在1962年所著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次论述了范式的定义。库恩认为范式是一个与“常规科学”密切相关的术语,之所以选择这个术语,意欲提出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②]。在库恩看来“范式”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集体所共同接受的一些理论、价值、技术、方法的总和,从而使这些“东西”在科学家集体的心中形成共同的理念、信仰,即“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③]。

库恩范式理论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正常科学(Normal Science):通常是指在某一范式的规范下进行的科学研究,科学共同体根据范式的统一规范进行观察、实验和理论构建。在库恩看来,正常科学是科学研究的常规状态,是科学发展的稳定阶段。二是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是指当范式无法解释新的事实或存在严重的矛盾时,科学研究领域就会出现重大变革和转

①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版,第65页。

②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8页。

③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9页。

型。库恩认为,科学革命通常会带来新的范式出现,从而引发了科学知识的重构和科学研究的深刻变化。三是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是指从旧的范式向另一个新的范式的转变过程。这不仅涉及到科学知识的更新,更涉及到科学共同体的理念、信仰和行为方式的改变。

(二)范式的基本特征

1.从范式的本质来看,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对范式的表述,是站在科学哲学的基础之上,而非站在一般的科学研究活动之上而言。范式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自然观和价值观,为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提供一种思维方式。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①。

2.从范式的基本要素看,它是集理念、信念、价值、技术于一体的综合性范畴。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反复强调,范式是一个具有整体性认识世界的框架和价值标准,是科学家集体所共同接受的一些理念、信念、价值、技术、方法的总和。

3.从范式的载体来看,科学共同体是其载体形式。范式的产生、形成、发展以及危机的出现,都与科学共同体的活动有关。科学共同体是范式的核心,是科学家组成的专业团体,具有共同的理念、信念、价值、技术和追求目标,为加强交流、促进科学进步而结合在一起。库恩的重要贡献,就是提供了科学共同体形成、发展、转换的认识论基础。

4.从范式的属性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范式具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自然科学通常只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如果出现第二个范式,就意味着范式革命,新范式将取代旧范式。而社会科学则不同,具有多重性,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存在着相互竞争的不同范式,它们可以互为补充、共存共生。

三、金融分析范式的变迁

随着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金融分析范式也在不断变迁。从现代金融(标准金融)分析范式,到行为金融分析范式,再到系统金融研究范式,可以说,“金融分析范式”的研究方兴未艾。

现代金融理论,继承了传统主流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其模型与范式是以“理性”作为基本分析框架的,并以“理性经济人”作为最基本的前提假设。由于现代金融分析范式中的投资者和市场都被严格标准化了,这就使得与现实投资者和投资行为有非常大的差距。所以,现代金融分析范式引起争议就在所难免,这也直接导致了行为金融分析范式的产生。

行为金融(Behavioral Finance)分析范式将行为科学、心理学、生命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范式融合到一起,从全新的角度对金融市场上的许多“异象”和市场的有效性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给出了全新的理论解释②。行为金融分析范式无论是在范式的科学性,还是分析手段和方法的多样性上,都具有更宽广的研究视角和特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系统科学理论开始应用于金融研究当中,并提出了系统金融理论研究范式。系统金融理论认为,系统科学能够全面有效地解决非线性、复杂性、动态性问题,应该将系统科学应用到经济研究尤其是金融研究中。金融市场是一个开放的、多层次的非线性复杂动力系统,因此,可以采用有限理性、分形、混沌、协同、突变、仿真以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加以研究。系统金融理论研究范式与现代金融和行为金融分析范式相比,更接近于实际情况,因而更能揭示金融市场的本质,是金融分析范式的发展方向。

---

①郭玮:《简述库恩的“范式”理论》,《山东青年》,2016年第4期。

②DANIEL K.,MARK W.,Aspects of Investor Psychology,*Journal of Portfolio Management*,1998,Vol. 24,No. 2,pp. 53-65.

在金融分析范式的研究上,张杰用经济哲学观和方法论,提出了金融分析范式的核心问题及逻辑结构,这种分析框架对于扩展乃至重建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具有长远意义。张杰认为[①],制度金融分析认定金融制度是一个有机结构,任何金融制度都具有存在的内生合理性。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不同于新古典金融学的个体主义还原论,而是重视个体与总体之间的加总逻辑及其特征。制度金融分析采用跨时均衡超越了新古典金融学的短期均衡。因此,构建制度金融分析框架标志着金融理论的道德转向,其兼容宏观与微观金融学的理论努力,更预示着金融学全新的范式革命。张杰[②]认为,新的金融分析范式一经形成,便会具有某种库恩意义上的“反观效应”或者重新审视功能。新的分析范式一旦形成,“以前不存在的或者被认为无足轻重的问题,可能会成为导致重大科学成就的基本问题”。

纵观已有的“金融分析范式”研究成果,有的是从经济学范式的概念出发,直接进行金融分析范式的研究;有的没有界定“金融分析范式”概念,只是对现代金融理论、行为金融理论、系统金融理论等进行“范式”的比较研究;有的虽然给出了“金融分析范式”的定义,但与普遍认同的“社会科学范式”概念相抵触;还有的从制度金融学入手,就金融分析制度范式进行理论解释。现有文献对金融分析范式的概念,也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

毫无疑问,以哲学求助为基础的“金融分析范式”研究,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对金融分析范式的优劣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对金融分析范式的要素也缺乏库恩“范式”的基本解构。尤其在普惠金融分析范式研究中,更缺乏对中国范式的整体性认识与前瞻性思考。这些都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努力,去不断探索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四、普惠金融“范式革命”:基于中国范式的分析框架

范式革命是从科学危机开始的。科学危机揭示了现有范式的不足和局限性,唤起了科学共同体对新范式探讨的激情。科学革命是范式革命的核心内容,通过科学革命,新范式得以形成并被广泛接受。范式转换才是范式革命的关键,它不仅涉及到理论的改变,更包括科学理念、价值判断、技术方法等的全面调整和变化。范式革命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推动科学的发展,更在于它要培育一个新的“科学共同体”,并引导其以开放的心态面对科学研究的挑战和机遇。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颠覆了金融只为富人服务的理念,更强调金融服务的均等化。从哲学意义上讲,它是一次全新的“范式革命”。现基于普惠金融的中国素材和实践,提出普惠金融的价值判断和分析框架。

(一)金融分析范式的要素解构

范式一词在库恩的“范式”理论中,具有多种不同的用法。玛格丽特·马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对此作了专门研究,她发现在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对“范式”一词共有21种不同用法[③]。对此,库恩在《对范式的再思考》一文中作出了回应和解释。库恩认为,范式的用法虽然有很多种,但基本的用法只有两种,一种是“综合”的用法,另一种是“局部”的用法。关于局部的用法,库恩认为那是一种“原初的使用”——那种在哲学上恰当的使用,指的就是各种类型的“范例”。而综合的用法,首先聚焦于常规科学的“科学共同体”这一概念,是科学共同体内所有成员具有的认识世界的框架和价值标准,是理念、理论、技术、价值为一身的综合性范畴[④]。

按照库恩对“范式”一词的综合用法,一种范式至少要具备共同的理念、理论、技术、价值等基

①张杰:《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哲学观及其他》,《金融评论》,2013年第2期。

②张杰:《金融学的范式革命》,《金融博览》,2020年第3期。

③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导读第11页。

④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导读第17页。

本要素。这可以引申到所有的科学研究中,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金融学在"范式"的研究上当然也适用库恩的综合用法。因此,一个完整的金融分析范式至少包含以下三种要素,即理念和信念要素、价值取向和技术标准。

1. 理念和信念要素:金融系统的运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理念和信念。理念是人们在理想、行为、价值观等方面的基本信念和追求,它是人们对环境、目标和方向的认知。商业金融的理念就是"赚钱",这是金融界从业人员的基本认知和世界观。近代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科学革命的爆发,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进步,这其中,金融的作用至关重要。但金融的名声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诟病,始终摆脱不了贪婪、嫌贫爱富、唯利是图的名声。

从历史来看,世界上的每一次经济危机几乎都与金融业有关。不管是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还是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抑或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每一次的大萧条、大危机、大灾难,都是从金融业发起,最终却由全世界的民众来买单。即使是多次爆发过占领华尔街的超大型示威游行,也依然无法阻止金融业继续"作恶",金融这个曾经高大上的行业,却成了"性本恶"的代名词。

金融业为什么只追求单一的盈利性、商业化诉求?显然这与金融理念和信念的扭曲有关。事实上,金融具有盈利性和功能性双重职能。单纯追求盈利性和市场效率,就会使得收入分配日益不均,并导致社会的动荡。因此,我国"十三五"规划中在布局金融发展时,首次放弃了金融市场化的表述,而是用了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商业金融并举这样的表述。而且,把这种结构与金融业的理念改变相联系。所谓理念改变,就是对金融而言不再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的经营目标,金融业更要承担社会责任。这一理念切中实际,而且也顺应了世界潮流。我们必须也应该顺应这一趋势,全面改善金融的理念和经营方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的那样: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要方面,就是"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金融业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把"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的实践要求落到实处,坚持在服务实体经济、服务普罗大众的过程中,创造价值和利润,实现盈利性和功能性的统一,让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

2.价值要素:价值观涉及人们在金融活动中对是非、对错、好坏、优劣等的基本认识和价值判断。就金融的价值取向而言,它是金融行业所选择的优势观念形态。从历史上看,金融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富人和有权势的阶层,先天含有阶层差异和身份的歧视,认为金融是贵族和富人的游戏,或者至少要具备一定的财富门槛和身份认定,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被排斥在了金融服务的制度边界之外,甚至出现了穷人储蓄借给富人使用的错配现象。由此造成了中小微企业"三农"等弱势群体的融资约束。

金融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带有歧视性?因为向穷人等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通常是无利可图的,在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化手段落后的情况下,无法识别穷人的偿还能力和偿还意愿,也无法识别好的金融和坏的金融,金融就成了嫌贫爱富的代名词。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仍有近20亿成年人无法享受到最基础的金融服务。穷人银行家尤努斯(Muhammad Yunus)将金融视为一项基本的人权,这一视角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商业金融的"基因"就是富人的游戏,如果"基因"不变,金融要为弱势群体服务基本上等于一句空话。如果没有金融的"范式革命",提倡金融的平民化就只是口号和乌托邦。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①],要"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金融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的丰富内涵,讲好中国的金融故事,建设好中国特色金融科学体系,坚定不移

①新华网:《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3-10/31/c_1129951150.htm,2023.10.31.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技术要素: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以及移动互联网为引领的新技术革命,必然会导致金融学科的边界扩展以及研究范式的重构。未来可以预见的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应用,一定会使传统金融的发展模式受到颠覆性冲击。这主要受两大因素影响:一是大数据的客观存在性,全球数据正以每年40%左右的速度在快速增长,这其中,金融数据占比很高,因为金融本身具有产生标准化海量数据的先天优势;二是人工智能等技术要素在算力、算法等方面的应用,会深刻改变商业金融的业态,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核心的金融技术会迎来新的变化,金融技术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着金融的模式和业态,决定着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水平和金融交易者的满意度。在一定的金融技术条件下,人们的金融能力构成了一个金融资源可分配的边界,并固化为严格的制度约束和操作程序。由于金融企业越来越需要创新的金融方案,来满足客户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因此,金融技术的创新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资源配置要求的不断变化而加速出现。

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学,是由两次“华尔街革命”的技术催生的:第一次是1952年马科维茨(Harry M. Markowitz)投资组合理论的问世,以及后来夏普(William F. Sharpe)等提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第二次是1973年布莱克(Black)和斯科尔斯(Scholes)的期权定价公式。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传统金融技术的核心要素,在证券理论界已得到普遍认同,在商业银行和保险领域也广泛使用。两次“华尔街革命”催生的技术,构成了传统商业金融范式的技术要素。

(二)普惠金融“范式革命”:基于中国范式的分析框架

普惠金融来源于传统的商业金融,但又是对传统金融范式的反思和扬弃。之所以说普惠金融是全新的“范式革命”,就在于普惠金融范式的基本要素,与传统金融范式的要素内容具有本质的区别。所谓中国范式,就是以普惠金融的中国素材和实践,对普惠金融的理念、价值取向、技术要素等作出价值判断和哲学求助。

1. 从范式的理念、信念要素看:中国范式的普惠金融理念是“以义取利”,追求大同、和谐与包容,它强调重义轻利、舍利取义和公平正义。这与传统商业金融信仰“赚钱”、“唯利是图”的理念有着本质区别。

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的概念来源于联合国,它的英文含义是包容性金融服务。Inclusive这个英文单词就是“包容广阔的、范围广泛的”意思,只是中文把它翻译成了“普惠”并约定俗成而已。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诚实守信、以义取利。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又鲜明提出了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这一重大课题,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核心要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天然蕴藏着包容、大同、和谐的理念,中国具有发展普惠金融独有的、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礼记·礼运》中写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段文字集中描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的包容、大同与和谐理念。除此之外,儒家和道家的哲学中,也都蕴含着丰富的“包容性”和“义利观”等思想文化资源。在我国传统的商帮文化中,浙商的价值追求是“义利双行”;徽商的经营理念是“以义为利”;晋商的行商准则是“利以义制”;儒商的精神更是“以义取利、以利济世、得之社会、用之社会,以和为贵、天人合一”。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认真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的精神实质,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充分挖掘出来,与一般的金融规律相结合,形成中国特有的普惠金融文化理念和文化信仰。与此同时,要从金融立法、金融司法和金融监管上重视金融的包容性和公平性,重建金融公平价值观。只有如此,才会改变传统金融理念“赚钱”、“唯利是图”、单一商业化的诉求,形成适合普惠金融发展的法律、制度和文化环境。

中国范式的普惠金融理念,要求金融业必须树立正确的经营观,平衡和兼顾好功能性和盈利性的关系。《荀子·荣辱》中讲:“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这句话深刻阐述了荣辱与义利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经营之道。中国范式的普惠金融,应当优先考虑金融道德、金融伦理和金融公平,而不是仅仅追求盈利性。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只有平衡好义利关系,才能行稳致远,保持健康高质量发展。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以来,我国的普惠金融事业发展迅速,金融服务的覆盖面逐步扩大,普惠金融可得性、满意度、可持续性不断增强。到2024年3月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31.4万亿,同比增速21.1%,贷款利率为4.42%,较2023年下降0.35个百分点。多种多样的小微贷款“应用场景”随处可见,普惠金融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得以缓释,普惠金融释放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巨大动能。中国的金融业要讲好自己的故事,在服务和推动国家战略、地方发展和人民福祉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2. 从范式的价值要素看:中国范式的普惠金融价值取向是“人民性”,它更强调金融服务的均等化,这就超越了传统商业金融只为富人和高端客户服务的价值取向。

金融的价值取向,由其所处的社会制度和性质来决定。西方金融的本质是为特权阶层、富人和社会精英服务,这种价值取向的外溢,进一步加剧了金融价值观的扭曲,引起了全社会对金融本质的质疑。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其救助引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对垄断资本导致的不公平分配格局的强烈抗议,这也加重了社会民众对金融“性本恶”的道德批判和认知。

中国范式普惠金融的价值取向是“人民性”,体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价值观。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特别强调金融工作的人民性,为中国范式的金融价值观提供了根本遵循。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可以说,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既是未来金融深化的发展趋势,也是实体经济和弱势群体对金融业提出的新要求。

进一步讲,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价值观有一点最值得期待,那就是金融不应该先天含有阶层差异和身份歧视,获得金融服务也是人权的重要内容,这实际上涉及到了金融道德、金融文化和金融法理,更涉及到金融行业所选择的优势价值形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是中国金融与西方金融模式的本质区别;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认识、分析和解决金融发展中的问题,这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让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所盼。只有深刻学习和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工作人民性的论述,才能领悟和洞察这种需求和变化。中国发展普惠金融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金融服务的均等化,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全新的金融价值观,完全颠覆了传统金融只为富人和高端客户服务的价值取向。这既是对金融价值观的重塑,更是一次全新的金融“范式革命”。

3. 从范式的技术要素看,中国范式的技术要素是基于“大数据和赋能平台”的数字金融微贷技术,它以数字资产替代抵押资产做风险评估,实现无感授信,重构了传统商业金融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核心的技术范式。

传统商业金融范式的技术要素,其核心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这一技术要素源于1952年马科维茨发表的投资组合选择的论文,这是现代金融技术的一次重大突破。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们开始研究和运用马科维茨的模型和思想,这些研究成果,最终形成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该模型是由夏普(1964年)、林纳特(1965年)和莫辛(1966年)共同提出的,因此,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也称之为SLM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从诞生的时间起,就被金融界、实业界的人士所接受和应用,并成为金融学术界不断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第一个可以进行计量检验的金融资产定价模型,由于它的理论浅显易懂、形式简洁明

了,不仅在证券市场大受欢迎,也被广泛运用于银行、保险、信托和基金等金融领域。它不仅有助于金融资产的分类,更被应用于计算资本的预期收益率。同时,还为资产定价、投资组合绩效测定乃至对人力资本进行定价提供了技术支撑。可以说,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是传统金融范式技术要素的核心,是金融“科学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认可的理论与技术标准。

中国范式的普惠金融技术,是对传统商业金融资本资产定价与建模技术的重构,它是基于“大数据和赋能平台”的数字金融微贷技术。它以数字资产替代抵押资产做风险评估,既能精准获客,又能控制风险。有别于传统的商业金融,数字普惠金融是通过技术和营销手段的创新,扩大金融服务的制度边界。数字普惠金融技术的本质,在于运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手段对传统金融服务进行数字化、智能化的改造升级和重构,可以提供网上支付、移动支付、网上银行、网上贷款、网上保险、网上基金等多种服务。尤其是通过数字技术,可以对客户进行精准“画像”,实现无感授信和透明化金融服务。这就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降低了交易成本,并在很大程度上优化了风险管理。此外,数字金融技术还具有长尾效应、规模效应和包容性等显著经济特征,能够更有效率地服务弱势客户,包括小微企业“三农”客户和低收入群体。

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数字金融作为“五篇大文章”之一被写入中央文件,日益凸显了其重要地位。目前,金融业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革命,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推动下,数字普惠金融技术正在颠覆传统的商业金融形态,数字金融已成为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未来金融“科学共同体”必须遵循的技术理论和标准。为此,需要加快构建和完善数字金融技术的生态体系,从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明确数字金融的技术标准和评估准则;需要加快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着重通过数字金融工具和产品创新,提升金融服务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人群的效率;需要进一步优化数字金融监管体系,建立健全适应数字金融发展的市场准入制度和公平竞争制度,加快建立数字化监管规则库,要进一步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中国范式的普惠金融微贷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讲已实现了“弯道超车”,走在了世界前列,这为普惠金融的“范式革命”提供了技术保障。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运用,我们要讲好中国的金融故事。普惠金融“范式革命”为我们提供了机遇,讲好中国金融故事的权利,应当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五、结论与建议

综上,普惠金融从哲学意义上颠覆了传统的金融范式,是一次全新的“范式革命”。从范式的理念、信念要素看:中国范式的普惠金融理念是“以义取利”,追求大同、和谐与包容,这与传统商业金融信仰“赚钱”“唯利是图”的理念有着本质区别;从范式的价值要素看:中国范式的普惠金融价值取向是“人民性”,它更强调金融服务的均等化,这就超越了传统商业金融只为富人和高端客户服务的价值取向;从范式的技术要素看,中国范式的技术要素是基于“大数据和赋能平台”的数字金融微贷技术,它以数字资产替代抵押资产做风险评估,重构了传统商业金融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核心的技术范式。为了更好的推动普惠金融范式研究,完善普惠金融范式分析框架,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构建普惠金融的生态体系。普惠金融不是单纯的金融机构,不是单纯的金融业务,也不是单纯的金融产品,而是一个金融生态系统。简言之,普惠金融的发展目标,就是要融入现有的金融体系,构建一种全新的金融生态,这是与中国40多年金融体系演变有密切逻辑关系的。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金融体系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大阶段。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可称之为财政金融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就是大财政小银行,银行本质上是国家财政的出纳机关;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的陆续成立和中国人民建设银

行的更名,人民银行开始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一套现代化的银行体系初步建立。与此同时,中国也建立和完善了资本市场体系。到本世纪初,随着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制上市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立,中国形成了完善的商业金融体系。这一阶段可称之为商业金融阶段,其本质特征就是为高端客户和富人服务;从2016年开始,中国金融体系进入了普惠金融阶段。现在,所有金融机构都在制定普惠金融战略以覆盖更多的客户和人群,追求金融服务的均等化。因此,构建普惠金融的生态体系,是完善普惠金融范式分析框架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一片适应普惠金融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土壤,才能保证普惠金融生根发芽,并形成一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平衡关系。

第二,加快普惠金融的数字化转型。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具有相互成就的互赢关系:一方面,金融科技技术已渗透到金融领域的各个方面,极大地助推了普惠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普惠金融作为全新的金融业态,又为金融科技的创新提供了"试验田"和应用场景。从早期的线上支付、线上理财,到之后的互联网保险、互联网基金、互联网融资,再到现在的依靠"ABCD技术"(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打通普惠金融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数字技术为普惠金融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构建普惠金融分析范式、完善普惠金融分析范式框架,需要更多的中国元素、中国经验,需要加快普惠金融的数字化转型。在数字金融革命中,中国已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数字金融的很多原创性试验和创新就在中国,这很令人振奋。但也需要理论界、业界和监管层的多方努力,才能让它"行稳致远",讲好中国的金融故事。加快普惠金融的数字化转型,值得期待的趋势在于:小微企业融资、乡村振兴中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更为精准;产业链、供应链金融服务应用场景的逐步扩展;区块链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更加深入;数据隐私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逐渐规范;金融科技监管的更加系统与全面等。

第三,深化普惠金融公平的法制建设。普惠金融作为全新的金融生态系统,宏观层面上的法律、法规制度化建设非常必要。现有的金融立法和金融监管,在理念上更多的是考虑"金融安全"和"金融效率",完全忽视了"金融公平"。现在,金融业的经营理念仍过分强调商业利益,过分强调金融风险,且未建立发展普惠金融的激励机制。当务之急,是以立法的形式加快普惠金融的实施。基于目前法制建设的现状,金融法需要来一场真正的"范式革命",补齐"金融公平"的法律缺口,使金融立法、金融监管、金融司法都面向"金融公平"作出相应的变革。这至少包括三方面工作:一是将金融消费者权利法律化,对金融消费者获得金融服务的权利作出特别保护;二是将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法律化,对金融机构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作出强制性规定;三是构建面向金融公平的监管制度,通过建立竞争性、多层次的金融体系,从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等供给层面为金融公平的实现提供保障。

[责任编辑:袁朋伟]